

第五十一期

二〇一八年 ■ 春/夏季

香港研究：健康與生活

- ▲ 宏觀因素、社會信任與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
- ▲ 香港中醫就診趨勢回顧
- ▲ 人生意義對華人長者生活質素的影響

香港

社會科學學報

「一帶一路」的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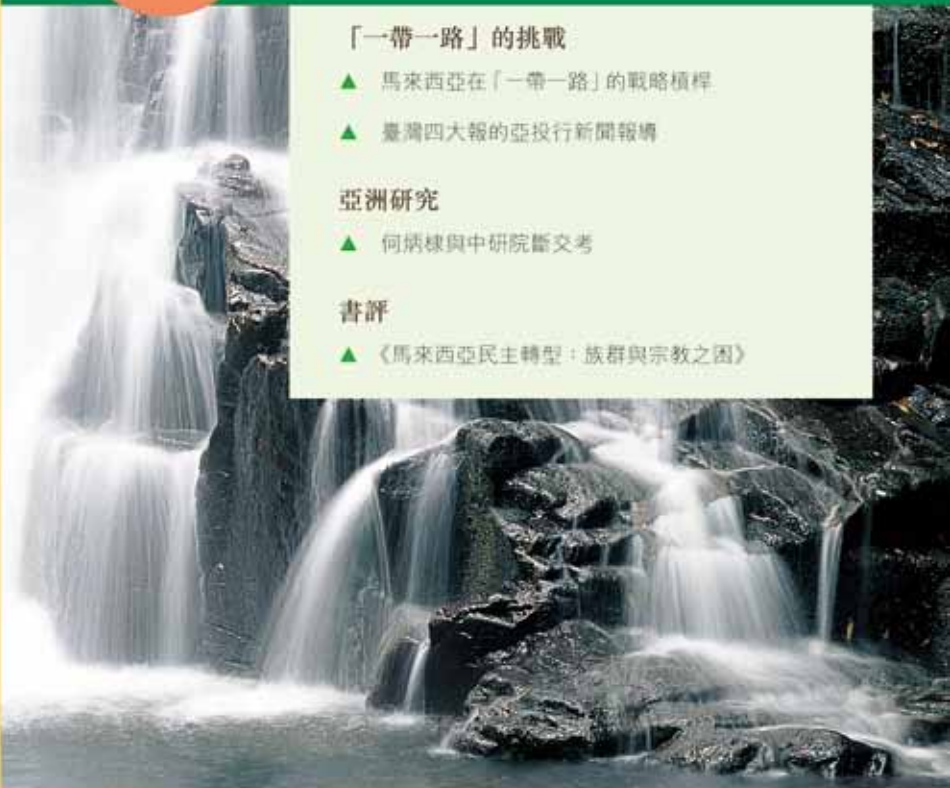
- ▲ 馬來西亞在「一帶一路」的戰略槓桿
- ▲ 臺灣四大報的亞投行新聞報導

亞洲研究

- ▲ 何炳棟與中研院斷交考

書評

- ▲ 《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族群與宗教之困》



敖恒宇 張宇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第五十一期 2018年春/夏季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No. 51 Spring / Summer 2018



大中華研究中心

Centre for Greater China Studies

宏觀因素、社會信任與 香港青少年的 生活滿意度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第五十一期 2018 年春/夏季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No. 51 Spring/Summer 2018

Macro Factors, Social Trust,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敖恒宇

Ngo Hang-yue

張宇樂

Francis Cheung

方偉晶 *

Eric Fong

摘要

生活滿意度被廣泛視為個人心靈健康的一個重要指標。對青少年來說，它跟他們在各方面的成長和發展有密切的關係。這個研究探討不同的因素，包括個人、家庭、宏觀環境及社會信任，對本港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所起的作用。我們的數據來自 2017 年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所進行的「香港年青人生活狀況調查」，該調查以問卷形式收集了 1,334 名高中學生

* 敖恒宇 香港中文大學管理學系教授

張宇樂 香港嶺南大學應用心理學系副教授

方偉晶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作者鳴謝香港中文大學資助的“Migration and Ground Boundary in Hong Kong” (2016-17) 研究計劃 (首席研究員為蔡玉萍教授) 提供問卷調查數據以作統計分析之用。

收稿日期：2018 年 2 月 8 日；接納日期：2018 年 4 月 4 日。

的資料。迴歸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顯示，個人因素 (例如性別、出生地及宗教信仰) 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不大，家庭財政狀況及家居條件有着促進的作用，而被訪者對教育制度及本港整體發展的觀感是重要的因素。此外，人際信任及社會制度信任對他們的生活滿意度亦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最後，我們討論本研究的學術貢獻、政策含意及研究限制。

關鍵詞

人際信任、生活滿意度、宏觀環境、制度信任、青少年

Abstract

Life satisfaction has widely been viewed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individual's well-being. It has been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s' development in several aspects. Previous studies have emphasized the influences of individual, family, and school factors on adolescents' life satisfaction, and largely neglected the role played by some macro factors, such as soci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s perceived by individuals.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 and compare the relative impacts of various factors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These factors include (1)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gender, place of birth, and religion, (2) family factors, such as parental education, household financial and living conditions, (3)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educational system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nd (4) interpersonal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We employed the data set of "The Hong Kong Youth Survey 2017" collected b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rental education have negligible effects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Family financial and living conditions, perceptions of educational system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nd interpersonal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of local adolescents.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discussed at the end.

Keywords

Adolescents, Institutional trust, Interpersonal trust, Life satisfaction, Macro factors

一 引言

生活滿意度 (life satisfaction) 是指個人依據自己的標準對生活質素的一個總體評估 (Pavot and Diener, 1993; 2008)。有學者認為它跟個人快樂、滿足及主觀的心靈健康同義 (Martikainen, 2009)。從正向心理學 (Positive Psychology) 的角度來看，生活滿意度可以引發出很多良好的結果，對兒童及青少年身心狀況尤為重要。有不少的外國研究顯示，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與他們各方面的成長 (包括性格發展、身心健康、社會關係、情緒及學業等) 關係密切 (Gilman and Huebner, 2003; Proctor et al., 2009; Oberle et al., 2011)。

當青少年享受較高的生活滿意度時，他們一般都會有較佳的身心健康狀況及社交生活，並且擁有較高的自尊心 (self-esteem) 及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在人際關係、家庭關係、學術表現、人格發展及健康各方面也較理想 (Hirschi, 2011; Proctor et al., 2011)。反過來說，較低的生活滿意度跟以下的狀況有關：(1) 心理及情緒失調，因而產生焦慮 (anxiety)、抑鬱 (depression)、孤單 (loneliness) 及壓力 (stress) 等問題 (Gilman et al., 2000)；(2) 偏差行為 (deviant behaviors)，例如濫藥、打架、醉酒以及提早離校等 (Gilman

and Huebner, 2003, Sun and Shek, 2010)；及(3)較差的精神健康狀態和較高的自殺念頭(State and Kern, 2017; Valois et al., 2004)。

此外，亦有研究發現，當青少年心理失調或面對高壓事件(stressful life events)時，較高的生活滿意度可以成為緩衝(buffer)，紓減這些問題對個人所造成的負面影響(Hirschi, 2011; Park, 2004)。基於以上原因，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受到教育工作者、心理學家、社工及輔導員的關注。學者相信，透過提高生活滿意度，可以為青少年帶來良好的身心成長和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文獻比較強調個人、家庭及學校等因素對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所造成的影響。除了這些因素外，青少年對於身處的社會環境及個人經歷所帶來的主觀感受和對事物的看法，同樣會影響他們對自己整體生活的評估。我們認為，青少年對他人及社會制度的信任程度，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然而，在過往的學術研究中，鮮有分析此類因素與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係。事實上，香港在過去幾年間經歷了很多重大的社會事件，不少青少年對這些變化有深刻的感受，由此影響他們的「人際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及「制度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的高低水平，我們認為值得探討宏觀環境和信任因素對本港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所起的作用。

二 研究目的

由於香港社會變得複雜和政治化，而此對市民的生活感受產生一定的影響，當中年輕人的情況更值得關注。近年來，一些本地的調查研究一致地顯示青少年對個人生活並不感到愜意。例如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屬下的「香港學生能力國

際評估中心」所做的一項研究發現，本地中學生的生活滿意度比其他國家為低（中文大學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通訊，2017）。

另一項全港性抽樣調查研究也顯示，在不同的年齡組別內，18-24歲的年輕人的主觀快樂指數是最低的（《明報》，2017）。此外，根據中文大學「生活質素研究中心」在2015至2016年度所進行的研究，香港青年生活質素指數比之前一年下降，在不同範疇中，社會、經濟及政治等三方面的生活滿意度較之前為差，特別在政治範疇內，被訪者對「青年政策措施滿意度」、「政策影響力評價」及「法治公平」這三個指標皆給予頗低的評分（香港中文大學生活質素研究中心，2016）。

最近，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發表了一項名為「香港中學生發展研究」的報告（2017），負責研究的學者發現，香港中學生整體對社會的信任度偏低，尤其是對政府和政黨的信任。在2,474名被訪者當中，約有41%的初中學生對香港政府表示不信任，而高中學生數字更達55.5%（立場新聞，2017）。

然而，我們對青少年生活滿意度下降的現象及其成因看來了解不足，因此有需要進行一個更全面和適時的學術研究，尋找影響他們生活滿意度的主要因素，並且嘗試回答以下的問題：

1. 青少年對社會狀況的看法，會否跟他們的生活滿意度有關呢？
 2. 青少年對他人及社會制度的信任，又會否影響他們的生活滿意度呢？
 3. 在各項不同類別的因素中（包括個人、家庭、宏觀環境及社會信任），哪些對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會有較大的影響呢？
- 為了取得答案，我們採用一個大型的中學生調查所得來的數據作統計分析。簡言之，我們以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作為焦點，

嘗試評估和比較不同的變項對其所起的作用。

三 文獻回顧

過去的研究顯示，影響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因素眾多，並且涉及不同的層面（可參考 Gilman and Huebner, 2003; Proctor, Linley and Maltby, 2009）。我們整理部分西方文獻後，將這些因素劃分為五大類別，現羅列如下：

第一類是個人因素，當中包括了性別、年齡、種族、宗教信仰等人口特徵，以及個人自尊（self-esteem）、性格（personality）、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及樂觀心態（optimism）等個人差異變項（individual differences variables）（Chow, 2005; Kong, Zhao and You, 2012; Oberle, Schonert-Reichl and Zumbo, 2011; Xie, 2016）。

第二類是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家庭收入、物質條件及家居生活狀況等（Chow, 2005; Lee and Yoo, 2015）。除此之外，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親子連繫（parental attachment）、父母管教方式及支援、家庭壓力（family stressors）等同樣重要（Chappel, Suldo and Ogg, 2014; Nickerson and Nagle, 2004; Oberle et al., 2011）。

第三類是跟學校及學習有關的因素，例如青少年人的學習經歷（academic experiences）、學業成績和成就、教師支援、學校生活的投入感（engagement）和滿意度（satisfaction）等（Chow, 2005; Danielsen et al., 2009; Dogan and Celik, 2014; Suldo et al., 2006）。

第四類涉及人際關係。除了家庭成員及教師外，青少年與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關係，友儕之間的連繫和支

援等，都屬於這個類別，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活滿意度（Chow, 2005; Lee and Yoo, 2015; Nickerson and Nagle, 2004）。

最後是有關居住區域（neighbourhood）及社區環境（community conditions），例如玩耍設施、社區安全及支援等，一些外國研究指出，此等因素對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產生一定的影響（Lee and Yoo, 2015; Oberle et al., 2011; Shields, Price and Wooden, 2009）。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研究較少考慮宏觀的政治、社會及經濟因素如何影響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這可能由於學者普遍認為家庭及學校對他們較為切身。而上述的宏觀因素，學者推論對成年人的重要性較在學的青少年為高，因為政治、社會及經濟環境對成年人在就業、消費及日常活動有直接關係，但對青少年的學習及起居生活所起的作用有限。

1 宏觀環境

西方文獻提出，若干宏觀環境因素，對一般民眾的生活滿意度帶來重大的影響（Bjørnskov, Dreher and Fischer, 2008），經濟狀況就是其中之一。當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市民面對高失業率的境況；又或是當經濟失控，通脹率高企，市民感到生活壓力時，他們的生活滿意度會下降（Di Tella et al., 2001）。此外，社會的經濟收入與財富分配的狀況，亦會影響民眾的生活滿意度，特別是當社會出現貧富懸殊，而人民又覺得現況是不合理和不公義時，他們的生活滿意度便會減低（Rodriguez-Pose and Maslauskaitė, 2011）。再者，市民對政府的角色及施政表現的看法，也是另一項重要的因素。

民主理論強調政治結構及過程對人民的生活質素及主觀的身心健康有着重要的關連（Lane, 2000）。事實上，一些西方研

究顯示，政治自主性（political autonomy）及廣泛的參與機會（extensive participatory opportunities）與人民的生活滿意度息息相關（Frey and Stutzer, 2000）。跨國性的研究也發現，政府的廉潔、效率、問責性及廣納意見，皆有助提升人民的生活滿意度（Helliwell, 2006; Helliwell and Huang, 2008）。另一方面，政府過度的開支則會產生相反的效果（Bjørnskov et al., 2007）。

總的來說，民眾會對政府在不同領域上的工作表現，以及政府所推出的各項經濟、社會及民生政策作出評估，再考慮這些政策會否影響他們的福祉。若他們的看法及評估是正面的，他們的生活滿意度將會上升，反之亦然（Bjørnskov et al., 2008; Whitney et al., 2010）。另有一些學者（例如：Radcliff, 2001；Lane, 2000）提出另一個觀點，以了解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與人民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係。他們認為，在民主國家裏，人們一般追求安居樂業及自由自在的生活。然而，當資本主義經濟向前發展，帶來分配不均及勞工剝削等社會問題，令他們失去了經濟上的安穩及個人的自主性，而政府又未能有效地解決有關問題時，市民會感到心理壓力和憂慮不安，由此減低他們的生活滿意度（Radcliff, 2001）。

除此之外，學者亦發現良好的政府管治，包括高問責性、高透明度及權力下放等，令社會制度運作得更為流暢，同時減少官員的貪腐問題，也有助提升市民的生活滿意度（Bjørnskov, Dreher and Fischer, 2008; Ott, 2010; Rodriguez-Pose and Maslauskaitė, 2011）。因此，民主政制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令市民對政府加添信任，也能提升他們的生活滿意度。

2 社會信任

信任是社會的基石，透過信任，人們願意在一個不確定、

甚至易受損的狀況下，跟別人合作。若人與人之間欠缺互信，在許多事情上都會懷疑對方的誠意及動機，要發展良好的合作關係便會變得相當困難。對於政府及社會制度，公眾的信任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如《論語》所言：「民無信不立」。

社會學家指出，信任是「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一個核心元素 (Putnam, 2000)。簡言之，社會資本涉及人際網絡中的互相信任和回報規範 (norm of reciprocity) 所帶來的資源及好處 (Coleman, 1988)，它對於民眾的生活滿意度有着促進的作用 (Bjørnskov, 2003; Helliwell, 2001; Leung et al., 2011; Ram, 2010)。良好的社會網絡及長久的關係，不但可以增加人際之間的互助互信，舒緩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對的壓力 (Biswas-Diener and Diener, 2006)，並且可以減少社會上的矛盾紛爭 (Churchill and Mishra, 2017)。此外，透過較佳的社會網絡，個人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源，和滿足社交上的需要，因而令人感到心境愉快，生活滿意度也會較高。

根據信任的對象，可以分為「人際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 及「制度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 兩種。前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取向，是對他人行為的一個正面的預期 (positive expectation) (Sapsford and Abbott, 2006)。一般來說，人際信任擔當以下幾個功能：包括：(1) 減低「坐便車」(free-riding) 現象的產生，提升個人與他人合作的動機和意欲；(2) 增進社會團結 (social cohesion) 及相互支援，並降低群體之間的衝突；(3) 強化社會網絡，令有用的資訊和創新意念得到更廣泛的擴散和流傳。由此推論，人際信任可以帶動經濟和社會發展，造福人群 (Delhey and Newton, 2003; Habibov and Afandi, 2015)。

值得注意的是，人際信任建立需時，以及非長久不變。西方的研究指出，專橫強權的政府管治模式對人際信任造成

破壞，尤其是獨裁政權為了施政順利，排斥「與民共議」的原則，甚至不惜使用手段激發人民的恐懼及互不信任，結果造成嚴重的社會分化（Marková, 2004; Paldam and Svendsen, 2001）。面對着社會撕裂及社會連繫（social ties）的削弱，有些年輕人變得躁動不安，對他人的信任程度降低，容易質疑對方的用心及目的。

另一方面，「制度信任」反映一般市民對社會正式制度（formal institutions）的態度（Rainer and Siedler, 2009）。制度信任的高與低，很多時取決於市民眼中不同的制度及政府機關能否發揮其功能，達致預期的表現（Lühiste, 2006; Wong, Wan and Hsiao, 2011）。若某些社會制度，例如醫療和社會福利，未能善用社會資源而達致有效的運作，市民便會失掉對它們的信任。

在極權國家裏，政治、金融、司法及教育等主要制度都是由單一政黨控制和指揮，無需向人民問責，因而忽略他們的需要和聲音，故此他們對社會制度的信任度並不高（Habibov and Afandi, 2015; Paldam and Svendsen, 2000）。研究顯示，在發達國家裏，制度信任與人民的生活滿意度之間存着正面的關連（Abbot et al., 2011; Leung et al., 2011）。當人民對社會制度有了充分的信任，他們就有安全感，無須多作防範，生活變得容易和安穩，對日常生活自然會感到愉快（Bjørnskov, 2008）。相反，若人民失去對社會制度的基本信任，他們對社會的歸屬感便會大打折扣，甚至考慮移民外地。

3 本地研究

以香港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為題的學術研究，其實也有不少。最早的研究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文直良（1991）指出

友儕 (peers) 與父母對中學生的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關係。之後，梁展鵬及其同事 (Leung and Leung, 1992; Leung and Zhang, 2000) 所做的研究，亦指出「自我概念」(self-concept) 及父母關係對本地初中生的生活滿意度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後者尤為重要。張雷及他的研究團隊 (Chang et al., 2003) 發現，除了上述兩項因素外，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及「學業上的自我概念」(academic self-concept) 也相當重要。對於父母管教方式，陳薇文 (2014) 發現權威式的教養模式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有助建立本港學生的回報型孝道觀念 (reciprocal filial piety)，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滿意度。

石丹理和他的同事 (Sum and Shek, 2010, 2012; Shek and Liu, 2014) 曾進行追蹤性研究，以了解本地中學生的生活滿意度。他們的研究指出，青少年的「正向發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包括社交、認知、情緒、道德、靈性、自主、身份認同及對未來的信念等)，與他們的生活滿意度關係密切，這兩個變項同時會影響青少年的問題行為 (problem behaviors)。此外，家庭的正常運作 (包括和諧與溝通等) 對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也有着促進的作用 (Shek and Liu, 2014)。

到了近年，袁月嫦 (2013, 2015, 2016a, 2016b & 2016c) 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本地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研究。簡言之，她發現下列的社會群組享有較高的生活滿意度：(1) 非華裔學生 (相對於本地學生)；(2) 低年級學生 (相對於高年級學生)；(3) 女性學生 (相對於男性學生)；(4) 有宗教信仰學生 (相對於無信仰學生)；(5) 家庭收入及父母教育程度較高 (相對於較低者)；及 (6) 就讀於有較多同族同學的學校內的南亞裔學生 (相對於新移民學生)。她的研究亦顯示學生的生活滿意度跟學校生活的投入程度 (school engagement) 有着正面的關係。總括來說，青少年的身份認同和地位，以及他們的家庭和學校狀

況，深深地影響了他們的價值觀、個人信念和對周遭事物及生活事件的看法（Yuen, 2013），這些因素最終對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造成頗大的影響。

根據以上的文獻，各類不同的因素對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都有着關連。我們預計，除了個人、家庭和學校因素外，青少年對外在環境的評估及對他人及社會制度的信任，同是重要的因素，因而有需要作出研究和分析。我們認為香港近年的社會狀況獨特，尤其經過「反國教」抗爭及「雨傘運動」後，青少年的政治意識提高，加上受通識教育的訓練，他們對政府施政及社會發展都帶有批判的眼光。因此，他們對於本港若干政治和社會議題均有自己的看法及觀感，從而影響他們對生活質素的總體評估。

四 研究方法

這項研究的數據來自 2017 年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所進行的「香港年青人生活狀況調查」，該項調查由數位學者所組成的團隊負責，研究對象是在本港就讀的高中學生。問卷調查在 2017 年 5 月至 7 月之間進行。先導測試於 2017 年 3 月完成，之後向 13 間中學（包括有不同本地、新移民及南亞裔學生人數的中學）發出邀請，四間學校拒絕，最終有九間學校同意接受問卷調查。受訪的學校按照學業成績分為三個組別，屬於第一組別（band 1）的學校有兩間，第二組別（band 2）的有四間，第三組別（band 3）的有三間。研究共發出 1,334 份問卷，收回有效問卷 1,213 份，回應率達 90.9%。問卷分為英文和中文兩個版本，其中收回的中文問卷有 978 份，英文問卷 235 份。受訪者的平均年齡是 16.5 歲。問卷由學校各班的老師負責派發給學生，學生自行填寫。完成的問卷由學生裝入密封

的信封內再交回，以確保其保密性。

以下我們會先列出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數字，並且報告變項之間的相關系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s），之後我們會進行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當中的因變項（dependent variable）是被訪者的生活滿意度，我們依次將不同類別的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s）放進四個迴歸模式（regression models）中，從而評估各項因素所造成的作用及他們在不同模式之間的變化。我們最先放入個人因素，之後加入家庭因素，接着是宏觀因素，最後的模式再加入信任因素。這種安排，有助我們有層次地了解不同類別的自變項的角色及相對重要性。

五 變項量度

我們採用了 Pavol and Diener (1993) 所設計的尺度（scale）去量度生活滿意度。該尺度由五題不同的描述所組成，其中一題是：「我的生活大致符合我的理想」。這個尺度在學術界內被廣泛使用，中文版本由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袁文得教授翻譯。我們提供五個答案的指標（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讓被訪者表達對各題的同意程度，並依此計算五題的平均值，作為顯示他們生活滿意度的高低水平。在本研究內，該尺度的信度（reliability）頗高，Alpha 系數達 0.85。

本研究包含了幾項家庭相關因素。首先，父母的教育程度顯示原生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同時亦反映不同的教養方式，例如較高學歷的父母一般會採用說理和身教的方法去教導孩童，而較少採用體罰的方式。在本研究內，父母教育程度分為五個類別，分別是：小學或以下、初中、高中、大專（非學位）及學士學位或以上，答案由被訪者填寫。此外，「家庭財政」的量度，是根據兩條問題的答案所得的平均數值所構成。

第一題問及被訪者是否滿意家庭的財政狀況（1 = 非常不滿意；5 = 非常滿意）；第二題問及被訪者的家庭有多常出現入不敷支的情況，我們提供了五個選項（1 = 總是，2 = 經常，3 = 有時，4 = 很少，5 = 從來沒有），讓被訪者選擇其一。量度這變項的尺度的 Alpha 系數為 0.66。「家居條件」由被訪者評估個人的家庭居住環境，由四題不同的描述所組成，分別是：（1）居住面積足夠大；（2）有自己獨立的空間；（3）有足夠的私隱；及（4）在家裏感覺舒適。我們提供五個選項（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讓被訪者選擇其一，並以此計算此四題的平均值。量度這變項的尺度所得出的 Alpha 系數是 0.81。

我們嘗試採用兩個自變項去顯示宏觀環境因素。首先是被訪者對本地教育制度的看法。此變項由兩題所組成，他們被問到是否同意以下的說法：「香港的教育制度大致符合我的理想」及「考試制度對年輕人學習風氣的影響大致正面」，我們提供了五個可能的答案（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我們以這兩題的平均值去量度被訪者對教育制度的觀感（尺度的 Alpha 系數為 0.79）。

問卷內有一部分問題，問及被訪者對香港的六項發展感到有多自豪，此六項分別是：（1）落實一國兩制；（2）民主發展；（3）經濟成就；（4）社會保障制度；（5）文化/體育發展；及（6）生活質素。被訪者採用一個四級的指標（1 = 一點也不自豪；4 = 非常自豪）去作答。由於以上六項分別涉及不同領域，我們進行了「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結果顯示它們同屬單一的因素，因此我們將這六項合為一個尺度，以量度被訪者對本地發展的整體觀感，其 Alpha 系數為 0.80。

問卷內另有一部分問題，被訪者被問及對不同對象的信任程度，其中三項涉及人際關係，對象分別是鄰居、朋友及家人，另外四項涉及社會制度，對象分別是特區政府、公共機

構、法庭及警察。被訪者使用一個四級的指標（1=一點也不信任；4=非常信任）去作答。我們以前三項的平均值去量度人際信任（尺度的 Alpha 系數為 0.62），及後四項的平均值去量度社會制度信任（尺度的 Alpha 系數為 0.78）。

最後，若干人口特徵亦包括在研究之內，分別有性別（女 = 1，男 = 0）、出生地點（香港出生 = 1，其他地方 = 0）及宗教信仰（有 = 1，沒有 = 0）。

六 研究結果

表 1 顯示本研究內各變項的描述性統計數字。在我們的樣本中，男女分佈約各佔一半。至於出生地點，約有 67% 的被訪者是在香港出生。他們當中，38% 有宗教信仰，而以基督宗教為最多。此外，他們的父母親教育水平普遍達高中水平。

表 1：不同變項的統計數值

變項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性別	1212	0	1	0.49	0.50
香港出生	1211	0	1	0.67	0.47
宗教信仰	1200	0	1	0.38	0.49
父親教育	1032	1	5	3.02	1.18
母親教育	1041	1	5	2.92	1.21
家庭財政	1187	1	5	3.60	0.83
家居條件	1191	1	5	3.50	0.81
教育制度	1209	1	5	2.35	0.97
本地發展	1207	1	4	2.65	0.57
人際信任	1211	1	4	3.10	0.53
制度信任	1211	1	4	2.46	0.52
生活滿意度	1210	1	5	3.10	0.75

值得注意的是，被訪者對教育制度的看法頗為負面，在 1-5 的尺度內，該變項的平均值只有 2.35。此外，他們對香港整體發展及制度信任的評量也不高，平均值分別是 2.65 及 2.46。至於生活滿意度的評量，僅達中度水平，平均值是 3.10。在眾多變項中，平均值較高的是家庭財政及家居條件，數值分別是 3.60 及 3.50。

在表 2 中，列出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當中有幾點值得留意。首先，兩項的宏觀因素之間有較強的正相關（positive correlation）（ $r=0.31$ ），而兩項的信任因素亦有類似的情況（ $r=0.42$ ）。至於因變項生活滿意度，除了個人因素外，它跟所有的自變項都有顯著的正相關，當中以教育制度的關連最強（ $r=0.38$ ）。

接着，我們以多元迴歸分析，去評估不同自變項對被訪者生活滿意度的影響，表 3 將四個不同的統計模式的結果及自變項的標準化系數（standardized coefficient）列出。模式（1）首先評估個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我們發現這類因素只有微小的影響（Model $R^2=0.01$ ）。跟以往的研究結果不同，性別在當中的作用並不顯著。若被訪者在香港出生，又或是有宗教信仰，他們的生活滿意度會較高。

模式（2）加入了幾項的家庭相關因素，結果顯示它們提供了額外的解釋能力（ $\Delta R^2=0.12$ ），當中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在統計上並不顯著（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而家庭財政及家居條件則有顯著的影響。如預期般，當家庭財政狀況較佳，又或是家居條件較為理想時，被訪者的生活滿意度會上升。

在模式（3）中，我們再加入兩項的宏觀因素，該模式的解釋能力進一步被提高（ $\Delta R^2=0.15$ ）。分析的結果顯示，教育制度及本地發展同是相當重要，可以促進被訪者的生活滿意度。換言之，對香港教育制度及整體發展帶有正面評估的中學

表 2：不同變項的相關系數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性別											
2. 香港出生	-0.03										
3. 宗教信仰	-0.01	-0.01									
4. 父親教育	-0.03	0.13**	0.08*								
5. 母親教育	-0.03	0.21**	0.08**	0.57**							
6. 家庭財政	0.00	0.16**	0.01	0.23**	0.21**						
7. 家居條件	-0.02	0.22**	0.04	0.16**	0.16**	0.36**					
8. 教育制度	0.00	-0.23**	0.09**	-0.04	-0.07*	-0.03	0.04				
9. 本地發展	0.10**	-0.08**	0.07*	-0.01	-0.05	0.06*	0.17**	0.31**			
10. 人際信任	0.05	0.07*	0.05	-0.01	0.01	0.14**	0.21**	0.04	0.23**		
11. 制度信任	0.09**	-0.05	0.05	-0.03	-0.02	0.10**	0.16**	0.29**	0.47**	0.42**	
12. 生活滿意度	-0.01	0.05	0.05	0.09**	0.10**	0.23**	0.32**	0.38**	0.30**	0.25**	0.29**

註：*p<0.05, **p<0.01

表 3：生活滿意度的迴歸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結果

自變項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個人因素				
性別	-0.02	-0.02	-0.04	-0.05
香港出生	0.07*	-0.03	0.06*	0.05
宗教信仰	0.08*	0.07*	0.03	0.02
家庭因素				
父親教育		0.01	0.02	0.03
母親教育		0.02	0.03	0.03
家庭財政		0.14**	0.15**	0.14**
家居條件		0.28**	0.21**	0.19**
宏觀因素				
教育制度			0.32**	0.31**
本地發展			0.17**	0.12**
信任因素				
人際信任				0.12**
制度信任				0.08*
R ²	0.01	0.14	0.29	0.31
F 數值	3.47*	21.42**	42.96**	39.02**
ΔR ²		0.12	0.15	0.02

註：*p<0.05, **p<0.01, N=969 模型內的數字為標準化系數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生，他們較為滿意自己目前的生活，反之亦然。此外，在這模式中，家庭財政及家居條件的作用仍然存在。

模式 (4) 包括上述各項的自變項及兩項的信任因素，是最終的全模式 (full model) (該 Model R² 為 0.31)。如我們所估計，除了家庭財政、家居條件、教育制度及本地發展這四個自變項繼續保留原有的作用外，新加入的兩項信任因素均對因變項有顯著而正面的影響。當被訪者有較高的人際及制度信任時，他們對自己的生活也感到較滿意。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模式內，所有的個人因素都沒有顯著的影響，這可能由於這些因素是透過其他的自變項去發揮它們的作用。例如有宗教信仰者，他們對教育制度及本地發展有較正面的評估。此外，本地出生的學生，他們的家庭財政及家居條件一般會比外地出生的同學為佳。

七 總結

對社會科學及教育研究的學者來說，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因為它跟他們在不同方面的成長和行為關係密切。以往的學術討論，比較着重個人、家庭及學校等因素。本研究除了考慮這些因素外，更進一步探討宏觀環境及社會信任對本地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所造成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個人因素及父母教育程度所起的作用有限，而家庭財政及家居條件則有顯著的效應。此外，青少年對教育制度及香港整體發展的觀感，也影響他們的生活滿意度。一如所料，我們發現人際信任和社會制度信任對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有着加強或提高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兩項宏觀因素對因變項的額外解釋能力 ($R^2=0.15$)，比諸各項個人及家庭因素合起來的解釋能力 ($R^2=0.14$) 還要大。由此可見，在今天的香港社會，教育制度及政經變化，深深地影響青少年的生活感受。再者，青少年對人際及社會制度的信任程度，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如西方文獻指出，信任是社會的基石，而當個人對周遭的人和事欠缺信任時，他對生活的滿意度將會降低，這個情況在本港青少年中也是一樣。

綜觀上述的結果，本研究作出了兩項新的貢獻。首先，我們引入宏觀因素去作為自變項，補充了過往研究的不足。迴歸分析顯示，它們所發揮的影響更大於本研究內所有個人及家庭因素。我們認為，不少本港的中學生對社會及政治環境有敏銳的觸覺，他們相當關注香港未來的發展，而他們對外在環境的評估頗影響他們對生活的感受。其次，我們肯定了信任因素的重要性，尤其當各項個人、家庭及宏觀因素被考慮後，人際信任及制度信任仍有正面作用。在模式 (4) 之中，制度信任

的作用較人際信任的影響為弱，可能由於該模式已包含了教育制度和本地發展這兩個跟制度信任相關的自變項，因而取走了部分效應。

由於香港獨特的社會文化，父母對子女的升學有很高的期望，總是強調學業成績的重要性，加上學校慣常操練學生，以爭取較佳的公開試表現，因此本地高中學生面對很大的讀書壓力。在這情況下，不少中學生對教育及考試制度感到不滿，身處困境而覺得無奈。根據一項由考評局委託香港大學所做的大型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中學生對中學文憑試（DSE）制度沒有信心，其中一個原因是文憑試過度決定他們日後的前途，從而造成巨大的壓力和不安情緒（《蘋果日報》，2017）。因此，他們對教育制度的觀感自然地影響他們對生活的滿意度。

另一方面，近年香港發生很多政治事件及轉變，特別涉及民主步伐、政制發展、人權和自由空間收窄等，引起公眾關注。中學生接受了通識教育的訓練，對政治的意識提高，部分學生更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及政制討論。在這氛圍下，青年人比從前更關心社會問題及香港的前景，而他們對香港各方面發展的看法，成為另一個影響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

總括而言，從我們的研究結果可以得到三點啟示。第一，透過改善家庭經濟狀況及家居環境有助提高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誠然，這方面跟社會結構（例如：社會階級及勞動市場）和房屋問題有關，並不容易改變現況。第二，青少年對本地的教育及考試制度普遍存有負面的看法，因此，推行以學生為本而非考試為本的教育政策，也許可以減低他們在學習上所承受的壓力。當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再面對過度的操練及應付各項考試，而是根據個人的興趣、能力和特質，去選擇適合自己的升學或就業前路，相信會令他們對自己的生活更感滿意。第三，很多的青少年對香港各方面的發展並不感到自豪，

甚至不滿現狀。此外，他們對人際關係及社會制度的信任也偏低，因而減低他們對生活的滿意度。要改變以上狀況，政府可以考慮透過更多不同的途徑，聆聽時下年輕人的聲音及各種訴求，並採取具體行動，進行真正的社會改革，以贏取他們對政府及社會制度的信任和支持。

常言道，年輕一代是社會的未來希望。今天，我們看到本地年輕人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和躁動，箇中原因錯綜複雜。本文嘗試以生活滿意度為切入點，探討各項不同的因素對此所起的作用。我們所得的結果顯示，青少年的生活處境和社會狀況，以及他們對他人及社會制度的信任程度，實為影響他們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原因。日後的研究，可朝着這個方向進行，特別是分析處境性因素（contextual variables）的角色，從而彌補以往研究不足之處，讓我們更了解香港青少年的期望和心態。

在這個研究內，我們採用了 2017 年「香港年青人生活狀況調查」的數據，由於內容上的限制，一些重要的變項並未包括在問卷之內，例如被訪者的學業成績、父母關係、自我形象及個人性格特徵等，都跟他們的生活滿意度有關。此外，我們亦欠缺資料去進一步分析生活滿意度對青少年帶來的心理及行為後果，而此有待日後研究去探討。最後，本研究採用了一些簡單的尺度去量度自變項，雖然它們符合香港的狀況，但個別自變項（例如人際信任及家庭財政狀況）的信度偏低，故此在這方面仍有改進的空間。

參考文獻

- 中文大學生活質素研究中心 (2016) : 〈中大公布最新香港青年生活質素指數 本港青年生活質素整體上升 八範疇六上升兩下跌〉, https://www.cuhk.edu.hk/hkiaps/qol/sources/YQOL/PR_YQOL_2017_Chi.pdf, 瀏覽日期: 2017年12月28日。
- 中文大學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通訊 (2017) : 〈切實提高幸福感: 由學校及家庭着手〉, 瀏覽日期: 2017年12月5日。
- 立場新聞 (2017) : 〈理大調查: 七成中學生不信任中國政府 近八成信任警察〉, <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E7%90%86%E5%A4%A7%E8%AA%BF%E6%9F%A5-%E4%B8%83%E6%88%90%E4%B8%AD%E5%AD%B8%E7%94%9F%E4%B8%8D%E4%BF%A1%E4%BB%BB%E4%B8%AD%E5%9C%8B%E6%94%BF%E5%BA%9C-%E8%BF%91%E5%85%AB%E6%88%90%E4%BF%A1%E4%BB%BB%E8%AD%A6%E5%AF%9F/>, 瀏覽日期: 2017年12月5日。
- 《明報》(2017) : 〈研究: 愈多家庭溝通愈快樂 18-24歲年輕人最不快樂 女較男高分〉, 瀏覽日期: 2017年5月12日。
- 《蘋果日報》(2017) : 〈34%中學生對DSE制度無信心〉, 瀏覽日期: 2017年8月8日。
- Abbott, P., Wallace, C., and Sapsford, R. (2011), "Surv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Social qual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use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 12, No. 2, pp. 199-223.
- Biswas-Diener, R., and Diener, E. (2006),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homeless, and lessons for happines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76, No. 2, pp. 185-205.
- Bjørnskov, C. (2003), "The happy few: 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social capital and life satisfaction," *Kyklos*, Vol. 56, No. 1, pp. 3-16.
- Bjørnskov, C. (2008), "Social capital and happ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Vol. 3, No. 1, pp. 43-62.
- Bjørnskov, C., Dreher, A., and Fischer, J. A. (2008), "Cross-country determinants of life satisfaction: Exploring different determinants across groups in society,"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Vol. 30, No. 1, pp. 119-173.
- Chang, L., McBride-Chang, C., Stewart, S., and Au, E. (2003), "Life satisfaction,

- self-concept, and family relations in Chinese adolescents and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Vol. 27, No. 2, pp. 182-189.
- Chappel, A. M., Suldo, S. M., and Ogg, J. A. (2014), “Associations between adolescents’ family stressors and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Vol. 23, No. 1, pp. 76-84.
- Chen, W. W.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 filial pie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Vol. 28, No. 3, pp. 308-320.
- Chow, H. P. (2005),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a Canadian prairie city: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70, No. 2, pp.139-150.
- Churchill, S. A., and Mishra, V. (2017), “Trust, social network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132, No. 1, pp. 313-339.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4, Supplement, pp. S95-S120.
- Danielsen, A. G., Samdal, O., Hetland, J., and Wold, B. (2009), “School-related social support and students’ perceived life satisfaction,”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 102, No. 4, pp. 303-320.
- Delhey, J., and Newton, K. (2003), “Who trusts? The origins of social trust in seven societies,” *European Societies*, Vol. 5, No. 2, pp. 93-137.
- Dogan, U., and Celik, E. (2014), “Examining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Educational Sciences: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14, No. 6, pp. 2121-2128.
- Frey, B. S., and Stutzer, A. (2000), “Happines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0, October, pp. 918-938.
- Gilman, R., and Huebner, S. (2003), “A review of life satisfaction research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 18, No. 2, pp. 192-205.
- Gilman, R., Huebner, E. S., and Laughlin, J. E. (2000), “A first study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with adolescen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52, No. 2, pp. 135-160.

- Habibov, N., and Afandi, E. (2015), "Pre-and post-crisis life-satisfaction and social trust in transitional countries: An initial assessment,"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121. No. 2, pp. 503-524.
- Helliwell, J. (2001), "Social capital, the economy and well-being" in K. Banting, A. Sharpe, and F. St-Hilarie (ed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Montreal and Ottawa: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 and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s, pp. 43-60.
- Helliwell, J. F. (2006), "Well-Being,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policy: What's new?"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6, pp. C34-C45.
- Helliwell, J. F., and Huang, H. (2008), "How's your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linking good government and well-being,"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8, No. 4, pp. 595-619.
- Hirschi, A. (2011), "Vocational identity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life and job satisfaction," *Applied Psychology*, Vol. 60, No. 4, pp. 622-644.
- Lane, R. E. (2000), *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Econom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ee, B. J., and Yoo, M. S. (2015),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correlates of children'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8, No. 1, pp. 151-175.
- Leung, J. P., and Leung, K. (1992), "Life satisfaction, self-concep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Vol. 21, No. 6, pp. 653-665.
- Leung, J. P., and Zhang, L. W. (2000), "Modelling life satisfaction of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Vol. 24, No. 1, pp. 99-104.
- Leung, A., Kier, C., Fung, T., Fung, L., and Sproule, R. (2011), "Searching for happines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 12, No. 3, pp. 443-462.
- Lühiste, K. (2006), "Explaining trust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ome illustrations from the Baltic state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9, No. 4, pp. 475-496.
- Man, P. (1991), "The influence of peers and parents on youth life satisfaction in

-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24, Vol. 4, pp. 347-365.
- Marková, I. (2004), *Trust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kainen, L. (2009), “The many faces of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Finnish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 10, pp. 721-737.
- Nickerson, A. B., and Nagle, R. J. (2004), “The influence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s on life satisfaction in middle childhood and early adolescenc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66, No. 1/2, pp. 35-60.
- Oberle, E., Schonert-Reichl, K. A., and Zumbo, B. D. (2011), “Life satisfaction in early adolescence: Personal, neighborhood, school, family, and peer influence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Vol. 40, No. 7, pp. 889-901.
- Ott, J. C. (2010), “Good governance and happiness in nations: Technical quality precedes democracy and quality beats siz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 11, No. 3, pp. 353-368.
- Paldam, M., and Svendsen, G. T. (2000), *Missing Social Capital and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Faculty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arhus School of Business.
- Park, N. (2004), “The rol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91, No. 1, pp. 25-39.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Pavot, W., and Diener, E. (1993), “Review of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Vol. 5, No. 2, pp. 164-172.
- Proctor, C. L., Linley, P. A., and Maltby, J. (2009), “Youth life satisfac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 10, No. 5, pp. 583-630.
- Proctor, C., Linley, P. A., and Maltby, J. (2010), “Very happy youths: Benefits of very high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adolescen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98, No. 3, pp. 519-532.
- Radcliff, B. (2001), “Politics, markets,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happin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 4, pp. 939-952.

- Rainer, H., and Siedler, T. (2009), "Does democracy foster trus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7, No. 2, pp. 251-269.
- Ram, R. (2010), "Social capital and happiness: Additional cross-country evidenc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 11, No. 4, pp. 409-418.
- Rodríguez-Pose, A., and Maslauskaitė, K. (2011), "Can policy make us happie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5, No. 1, pp. 77-96.
- Sapsford, R., and Abbott, P. (2006), "Trust, confidence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39, No. 1, pp. 59-71.
- Shek, D. T., and Liu, T. T. (2014), "Life satisfaction in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A 3-year longitudinal stud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117, No. 3, pp. 777-794.
- Shields, M. A., Price, S. W., and Wooden, M. (2009),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neighborhood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22, No. 2, pp. 421-443.
- State, T. M., and Kern, L. (2017),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social,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Journal of 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s*, Vol. 19, No. 4, pp. 205-215.
- Suldo, S. M., Riley, K. N., and Shaffer, E. J. (2006), "Academic correlate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life satisfaction,"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Vol. 27, No. 5, pp. 567-582.
- Sun, R. C., and Shek, D. T. (2010), "Life satisfaction,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and problem behaviour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95, No. 3, pp. 455-474.
- Sun, R. C., and Shek, D. T. (2012),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life satisfaction and problem behaviour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A replic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105, No. 3, pp. 541-559.
- Valois, R. F., Zullig, K. J., Huebner, E. S., and Drane, J. W. (2004), "Life satisfaction and suicide among high school adolescents," in A. Dannerbeck, F. Casas, M. Sadurni, and G. Coenders (eds), *Quality-of-Life Research o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etherlands: Springer, pp. 81-105.

- Whiteley, P., Clarke, H. D., Sanders, D., and Stewart, M. C. (2010),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2, No. 3, pp. 733-746.
- Wong, T. K. Y., Wan, P. S., and Hsiao, H. H. M. (2011), "The bases of political trust in six Asian societies: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explanations compar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2, No. 3, pp. 263-281.
- Xie, Q., Fan, W., Wong, P., and Cheung, F. M. (2016), "Personality and parenting style as predi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secondary students," *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Vol. 25, No. 3, pp. 423-432.
- Yuen, C. Y. (2013), "Ethnicity, level of study, gender, religious affili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adolescents from diverse culture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Vol. 16, No. 6, pp. 776-791.
- Yuen, C. Y. (2015), "Gender differences in life satisfaction and spiritual health among the junior immigrant and local Hong Kong secondary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Spirituality*, Vol. 20, No. 2, pp. 139-154.
- Yuen, C. Y., Lee, M., and Leung, C. S. S. (2016a), "Religious belief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life satisfaction of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Beliefs and Values*, Vol. 37, No. 1, pp. 103-113.
- Yuen, Y. M. C., and Lee, M. (2016b), "Mapping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with high ethnic concentration," *Youth and Society*, Vol. 48, No. 4, pp. 539-556.
- Yuen, C. Y. (2016c), "Linking life satisfaction with school engagement of secondary students from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 77, pp.74-82.